

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

(日)後藤昭雄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日)後藤昭雄著;高兵兵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7-101-04911-7

I. 日… II. ①後…②高… III. 中国—古典文学—影响—日本—古典文学—研究 IV. I 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5466 号

- 书 名** 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
-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 编 著 者** (日) 後藤昭雄
- 译 者** 高兵兵
- 责任编辑** 马 燕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8 千字
- 印 数** 1—40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911-7/I·668
- 定 价** 16.00 元
-

总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



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



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



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



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



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目 录

| | |
|-----------|---|
| 自 序 | 1 |
|-----------|---|

| | |
|----------------|---|
| 平安朝汉文学概述 | 1 |
|----------------|---|

第一部 日中文化往来

| | |
|------------------------------|----|
| 关于《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的佚文 | 17 |
| 传入中国的日本著作 | |
| ——淡海三船著《大乘起信论注》 | 32 |
| 关于一首假托延历遣唐使诗 | 40 |
| 往来于日唐间的佛教经典——《千手仪轨》之相传 | 45 |
| 入唐僧带回日本的文献——赞文与碑文 | 55 |
| 关于金刚寺藏《文集抄》 | 67 |

第二部 日本汉文学与中国文学

| | |
|------------------------------|-----|
| 平安朝人与《后汉书》 | 77 |
| 平安朝“乐府”与菅原道真的“新乐府” | 85 |
| 菅原道真与白居易——《菅家文草》的编纂及诗注 | 104 |
| 菅原道真的咏竹诗 | 121 |



| | |
|--|-----|
| 尚齿会的源流 | 135 |
| 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对平安朝文学的影响 | 141 |
| 菅原文时的《老闲行》 | 152 |
| 大江匡房的《诗境记》 ——日本人 11 世纪撰写的中国诗歌史略 | 160 |
| 《续日本纪》里的中国口语 | 178 |
| 平安朝诗文里的中国口语 | 196 |
| | |
| 译后记 | 211 |

自序

在日本，一般称中国的古典诗歌为“汉诗”，文章为“汉文”。

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由中国传入的汉字。而汉字只是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形式之一，与汉字一起传入的还有书籍。通过阅读中国书籍，古代日本人摄取了中国的思想、文学、法律等。日本人摄取的中国文化中，文学占了绝大部分，日本人在阅读和学习中国文学的基础上，进而自己模仿着用汉字创作汉诗、汉文。日本人创作的汉诗、汉文，或者说凡是用汉字创作的文学作品，我们统称为“汉文学”。本书书名中的“汉文学”，即指此意。

书名“汉文学”前还冠有“古代”，下面介绍一下日本历史年代的划分。日本历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和近代四大部分，古代指十二世纪末以前的历史阶段。其中，又以八世纪末迁都于“平安京”（今京都市）为界，划分为前期和后期。本书所言“古代”，主要指古代后期，因定都平安京，所以亦称“平安时代”或“平安朝”。文学史中一般也沿用“平安时代”或“平安朝”这种提法，指八世纪末至十二世纪末这四百年。

我所从事的，主要是对平安时代（古代后期）日本人创作的汉诗汉文进行考证和研究。本书从我以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取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有密切关系的，集成一册。

起卷“平安朝汉文学概述”，顾名思义，是对平安时代四百年汉



文学的演变情况予以概观，列举了平安时代问世的主要诗集、文集，以及当时主要的诗人、文人，阐述出平安朝汉文学发展的轨迹。

第一部“日中文化往来”所收的论文，内容都与日中两国之间人物或书籍的往来相关。

古代日本与大唐有国交。日本派往中国的外交使节，称遣唐使，他们将先进的中国文化及文物带回日本。古代的日中文化交流，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东西传入日本，但也有日本人创作的汉文学作品或著作反传入中国的时候，《关于〈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佚文》和《传入中国的日本著作》两篇，谈的就是这种情况，它们都是根据大阪府河内长野市金刚寺发现的资料展开论述的。

遣唐使赴中国时，往往有僧侣随行，为的是在中国学习佛学。这些僧侣回国时，会带回大量的经书，这是国家赋予“入唐僧”的一大使命，他们带回的书籍中也包括一些文学方面的文献。入唐僧为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往来于日唐间的佛教经典》和《入唐僧带回日本的文献》两篇论述，就是论证这一点的。

传到日本的中国书籍，有很多流传至今，有的是原本保留，有的是日本人以中国带回的书为底本所作的抄本。现存书中有一些在中国已经失传，我们称之为“佚存书”。留存于日本的传本，有的能较好地再现原书的初期形态，资料价值极高，《关于金刚寺藏〈文集抄〉》一篇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例。白居易的诗文集《白氏文集》，在日本广为流传，对日本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文集抄》就是一个例证，它由《白氏文集》中抄出的赋和诗构成，保持了《白氏文集》较原始的形态，是一部相当宝贵的文献。

第二部“日本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论文，有的是论述中国文学对平安朝汉文学的影响，有的则是论述当时日本人如何摄取、



发展中国文学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本书是受王晓平教授推荐编入这套丛书的。回想 1994 年我出席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幸第一次访问中国,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就是受王晓平先生的邀请。是他,给了我难得的机会,让我从此注视中国,并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度。十年来,我将近 20 次访问中国。今天,又是王教授举荐,使我又有了这个向中国读者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在此,谨向王晓平教授致以衷心谢忱。

翻译本书,我委托正在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高兵兵女士。她曾执教于中日两国的大学(西北大学和长崎县立大学),现在研究方向又恰巧是平安时代汉文学,翻译任务交给她,非常适宜。也感谢高兵兵女士的辛勤工作。

在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着对日本汉文学的偏见,有的说它是中国文学的亚流,还有人说用汉字创作的汉诗文称不上是地道的日本文学。近年,学界终于开始对汉文学给予公正评价,它正在被广泛欣赏和深入研究。但我想,许多中国人恐还不知道日本曾有过模仿中国用汉字创作的文学。我希望,通过本书,能使更多中国读者对日本汉文学有一个新的认识 and 了解。

2004 年 8 月 14 日于奈良

平安朝汉文学概述

“敕撰三集”时代

8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日本古代后期，因定都于平安京（今京都市），所以一般称之为“平安朝”。平安朝文学，除了以女作家为主体的“假名文学”外，还有汉文学。其实在当时，汉文学才是官僚贵族所必需的、最正统的文学形式。在延绵的汉文学史上，以“敕撰三集”（以下引号略）为代表的9世纪前半期汉文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它不仅迎来了汉文学史上第一个隆盛期，而且还在“国风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挽救了文学空白的危机。更在和歌文学再度繁荣之前，为即将到来的古今和歌集时代作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敕撰三集时代基本上相当于嵯峨天皇（786～842）时代，其当政以及作为太上皇继续推行嵯峨体制的天长、承和年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唐风文化兴盛到了极点，敕撰三集即是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它们的出现，源自崇拜大唐的时代潮流，这一潮流虽在嵯峨之父桓武天皇时就已出现，但能渗透宫廷上下达到极至，还是在嵯峨时代。例如，天皇的谥号“嵯峨”，本是大唐长安附近一座山名，唐德宗葬于此，而嵯峨天皇陵所在的京都嵯峨野，正是援用了长安德宗陵的地名。



称扬和赞美中国文化,导致敕撰三集问世的直接原因,是“文章经国”思想。这一思想源于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之著名论断。魏文帝本意是通过与治国方略相比来衡量文学的价值,通过与短暂人生相比来宣扬文学不灭的主张。但到了日本,性质有所改变,它极力标榜文学创作本身对治国有益,这无疑为诗文创作及诗集编纂的正统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敕撰三集就是在上述时代思潮和文学观的影响下相继问世的。弘仁五年(814),《凌云集》问世,它是第一部敕撰的文学作品集。四年后,《文华秀丽集》问世,该集在作者构成上最能反映嵯峨文坛的色彩,在三集中占有独特的位置。淳和天皇天长四年(827),《经国集》问世,它由20卷构成,其作者和作品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采录年代之广等均居三集之首,可谓集日本古代汉文学之大成。

嵯峨天皇时代,随着文事的兴隆,诗宴大大流行起来,敕撰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出自这种“君臣唱和”式的诗宴。奢侈、享乐性诗宴的频繁举行,逐渐削弱了律令制国家的财政,但诗宴又得到文章经国思想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吟诗作赋这一行为,同时具备了治国与享乐的双重性。

这种两面性也体现在当时的文人身上,比如小野岑守,他不仅是编纂《凌云集》的核心人物、文章经国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实际的诗作数量,也仅次于嵯峨天皇和滋野贞主,在三集中列第三位,可谓是有代表性的文人;同时,他还是身居参议大宰大貳的高官,弘仁十四年(823),他曾为抵制律令制衰退的趋势,对律令加以可行性修改,还建议并创立了公营田制,以维护律令制度。三集中



其他主要诗人，如藤原冬嗣、良岑安世、菅原清公、滋野贞主等，也和岑守一样，都同时具有宫廷诗人和律令制官员这种双重身份。

总之，双重并存，是这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特点的《文华秀丽集》，既是文章经国思想的典型体现，同时也鼓吹唯美。另外，本来是文学理论的《典论》，却被与朝政联系在一起，同样反映出双重性的时代特征。

僧侣文学

嵯峨时代，除宫廷贵族外，还有僧侣创作的文学，我们称为僧侣文学。其巅峰性人物，当属空海，他的主要著作有：收录了各种体裁诗文的《遍照发挥性灵集》，以戏曲形式演绎佛教优于儒道二教说的《三教指归》，读解汉文用的工具书《篆隶万象名义》，文论《文镜秘府论》等，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远远超过其他人。空海不仅是僧侣文学之冠，也是平安朝初期文坛的魁首。

当时，包括空海在内，有很多僧侣到过大唐，其中有一位圆仁写了一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它首次使用“和习汉文”，以纪实手法描写了在唐十年的所见所闻，是纪行日记文体的先驱。

仁明天皇时代

仁明天皇时代，是日本汉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形期。承和九年，嵯峨天皇刚去世，就发生了“承和之变”，藤原氏迈开了走向霸权的第一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具有文人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人，逐渐被排挤到政事决策圈以外，成为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职业



文人,封闭的文人圈逐步形成,继而文人圈内又产生了许多门第学问。通过《三代实录·春澄善绳传》,可以了解仁明天皇时代始见此弊端的情况。

这一时代还是白居易诗文初传日本、汉文学从此走向新时代的开端。承和五年(838),大宰少貳藤原岳守首奉“元白诗集”,翌年,遣唐使又带回了白居易的诗文集,承和十四年,入唐僧圆仁和惠萼也带回白氏诗文集。以往以六朝、初唐文学为典范的诗人们,立即对这一新传入的文学作出了敏锐反应。从此,白居易文学不仅对日本的汉文学,甚至对“假名文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小野岑守之子小野篁(802~852)的作品,恰好体现了这一新时代的到来,从其《扶桑集》所收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受白居易影响的痕迹。篁在被任命为承和遣唐使之后却遭流放,被发配到隐岐荒岛时,愤怒地写下了《西道谣》、《谪行吟》等诗篇,他通过写诗来标榜自己的价值,倾诉对现实的不满。这种述怀诗,是菅原道真文学的先导。此外,篁在逆境中还作有抒发忧愤的和歌,收于《古今和歌集》。他是和歌复兴前兆中产生的,既做诗又作和歌即所谓“和汉兼作”的新型文人。

对唐风一边倒风潮进行反思,希求回归“日域日本之文章”的倾向,见于《日观集》,从现存的序文中可知,它采录作品的上限是承和,开卷第一人正是小野篁。这极其准确地提示了承和时期的文学特征。